

蒙元耀 著

壮汉语 同源词 研究

ZHUANGHANYU
TONGYUANCI
YANJIU

民族出版社

本书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项目资助，特此感谢！

壮汉语 同源词 研究

蒙元耀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壮汉语同源词研究/蒙元耀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3

ISBN 978 - 7 - 105 - 10661 - 5

I . 壮… II . 蒙… III . 同源词—研究—汉语、壮语
IV . H13 H21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3793 号

责任编辑: 欧泽

封面设计: 金晔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ebs.com>

印 刷: 北京艺辉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28 千字

印 张: 11.375

定 价: 28.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0661 - 5/H · 733(汉 224)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010 - 58130047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内容提要

壮侗语族与汉藏语的关系目前存在着多种解释。本书以身体部位名称、常见动植物以及日常事物等为研究对象，并由此旁涉壮语的构词法，运用音韵学原理和相关的语言学理论，通过语音和词义的对应，探讨了二百多条壮汉语常见词目的渊源关系，藉此追寻壮语部分词义的本源，并探求壮、汉语是否存在同源关系。同源关系研究一般要选取基本词汇部分来进行比较。本书在材料挖掘方面尽力用功，发掘了许多未曾受人注意的材料，对别人已经讨论过的词目也有所补充。经过精心比较分析，壮汉语之间的关系确实出自上古，两者存在共同的来源。因讨论的材料不局限于壮语和汉语，也涉及壮侗语族和藏缅语族，故本书实际探讨的是壮侗语族与汉藏语群团的历史关系。书中归纳的一些语音对应规律可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壮侗语跟汉藏语的关系。语言事实显示，壮汉语是有共同来源的两大语言。百越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否定壮汉语存在同源关系的说法是应该抛弃的。

目 录

目 录
绪 论 (1)
一、壮家人的根..... (3)
二、百越民族的分布..... (7)
三、古百越人与华夏人的渊源..... (11)
四、汉台语的比较研究..... (20)
五、本书的研究方法及行文结构..... (24)
第一章 身体部位 (28)
一、头部名称..... (29)
二、躯干部位及内脏名称..... (43)
三、四肢部位的名称..... (64)
四、相关问题的讨论..... (78)
小结 (88)
第二章 动物名称 (90)
一、兽类..... (91)
二、鸟类 (107)
三、水生类..... (118)
四、爬虫类..... (131)
五、相关的渔猎手段..... (147)
小结..... (155)
第三章 植物名称 (157)
一、竹木..... (158)

二、果类.....	(168)
三、花草.....	(178)
四、农作物.....	(190)
五、相关问题的讨论.....	(211)
小结.....	(216)
第四章 日常事物.....	(218)
一、天象.....	(219)
二、地物.....	(230)
(1) 三、建筑.....	(246)
(2) 四、日用器物.....	(257)
(3) 五、相关问题的讨论.....	(273)
(4) 小结.....	(277)
第五章 构词法的研究.....	(279)
(1) 一、与汉语相关的声调屈折词族.....	(281)
(2) 二、民族固有词构成的声调屈折词族.....	(295)
(3) 三、与汉语相关的声母交替词族.....	(306)
(4) 四、民族固有词声母交替构成的词族.....	(326)
(5) 五、相关问题的探讨.....	(337)
(6) 小结.....	(341)
结论.....	(344)
主要参考书目.....	(351)
后记.....	(356)
(301).....	卷之二
(311).....	卷之三
(315).....	卷之四
(316).....	卷之五
(317).....	卷之六
(318).....	卷之七
(319).....	卷之八

式出而以同族树之。云之音要皆由口鼻，故雖去勇明，則固猶識
而猶或失其人言之謂能長辭耳，雖或費詞而固執與私也知破者。今
則其氣故失于參差，益失

云和古柳文字中多成句聲并三周而變，察字來更重乾坤視是
而猶或忘古文韻，故猶或曉之而更對，外相傳詩古或舉商丘之爭
而吾等类人言之內發固中从云故。今既失之，則其聲自當失其韻
而猶或曉之而更對，猶或失輸與明未尚無固就彼类人言之而猶或曉之而
猶基。玄亦立張去天琪而余而密氣耳。附卷而即口音也。其聲既失

留頤。汉藏语言系属的分类研究始于 19 世纪初叶，至今已有两个世纪
的时间跨度。然而如何对这些语言群团进行分类，学者们的观点依
然未能统一。侗台语族与周边语言的关系一直是语言学界的热门话
题。自李方桂先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侗台语族应归属汉藏语系的假说后，这一学术观点即不断地受到挑战，进而推动了该领域的
研究。目前，侗台语族与汉藏诸语的关系存在着多种解释。

秦始皇用兵岭南之后，汉语凭借着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
多方面的优势，其词汇源源不断地进入侗台诸语。年长日久，汉语
已经渗透到侗台诸语的每一个层面。事实上，侗台诸语的语言面貌
与汉语非常近似。无论是音节结构、声调种类、词汇构成或者是语
法现象，这些都与汉语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这种相似是同源关系的反映抑或是语言借贷的相互影响？专家们
见仁见智，有时甚至争论很激烈。

要解决这个学术纷争，如何鉴别同源词和借词是解决这一问题
的关键。可至今为止，区别两者的原则还是处于若明若暗的状态。
尽管方家们提出种种鉴别同源词的方法，但行之有效且令人完全信
服的却并不太多。究其原因，首先是这些语言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其次是这些语言的历史非常古老，再者是侗台诸语缺少古代历史文
献。受这些因素制约，要解决这个学术纷争只能是一步步地探明历
史真相，逐渐逼近真理。

就讨论问题的技术层面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寻找汉语的源头和

方言，恢复古语文本对等一脉的传承。而到了现代，随着“新方言”“新古语”“新方言古语”等概念的提出，

形成的时间。即便是假设，我们也需要有这么一个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假如缺少这项共同的预设约定，任何讨论都会陷入漫无边际的状态，最终无法达成共识。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夏商周三代被认为是中华文明之开始。在此之前是远古传说的时代。按现今看到的说法，最为古老的推测是汉语已经使用了 100 多万年。^① 这是从中国境内的古人类考古材料来推断的。在人类起源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之前，这种推测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有限的分析。但严密的论证却无法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从文字来看，目前见到最古老的汉字是甲骨文，这是商代遗留的文物，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要论证壮汉两个语言群团是否具有发生学关系，或许最可靠的出发点就是商代的甲骨文。

商代文化的主人是东夷人，商最早是从古东夷人的少昊部落分化出来的。^② 甲骨文是记录汉语的，这已经得到举世公认。探讨壮汉两种语言的关系，可以从古百越人与东夷人的渊源去追寻。只要能够证明古东夷人和古百越人有共同的来源，这个问题就有希望得到解决。

当然，观察角度不同，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也会导致结论互不相同。一旦转换观察的角度，跳出原有的框架，多一些包容和理解，我们就会看到，百越语言跟汉语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密切的。首先，古百越文化是海洋性质的文化；其次，上古时代的百越海洋文化并不落后。着眼于上古汉字初创之际，许多跟财宝货币相关的常用字都以贝为义符，如：财、寶、货、貸、貴、贱、貧、貪、賊、賈、價、賦、貢、販、買、賣、費、貿、債、賄、賂、賂、資、賑、贖等等，这些字几乎涉及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贝为财宝，说明中国上古曾经通行过以贝为货币的时代，而且这个时代并不短。否则上古汉字之中不会有那么多的字以贝为部首。金属货币出现在商末，贝作流通货币当在此前，而甲骨文也出现在商朝。据此可以推

^① 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79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② 孟世凯：《商史与商代文明》，43 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

断，汉字产生的初始时期肯定还在使用贝类充当货币。^① 贝为财宝从侧面说明了当时海洋文化占优的局势。换言之，远在上古百越先民也曾有过显赫的历史。否则，没有强劲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作支撑，人们不会选择这些海产品来作流通货币。

用这种眼光重新审视历史，我们发现很多基本词目在壮汉两大语言群团中有着整齐的对应。假如我们相信这些语言事实能反映某些历史真相，那么，我们需要开拓更精细的研究领域。

于本书的研究而言，探究壮汉两种语言的关系固然是学术的需要。然笔者更看重的是借助汉字的古音古义来梳理壮语词汇的文化底蕴，为壮语词汇寻找其初始之源，进而加以解释。反过来，从壮语词汇出发，找到某些能够对应得上的汉字古音古义，我们也可以从汉族古籍来验证壮语词义的来源。透过词义比较，掌握其引申变化的轨迹，这对壮语词汇研究而言，意义非常重大。对某些壮语词汇进行溯源之时，若能从中探知壮汉语历史关系的一些实情，那将是一件很令人振奋的工作。

毫无疑问，要做好这些工作，除了从壮、汉两种语言自身去寻求各种证据之外，或许还有赖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尤其是考古学的成果方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这项工作很艰难，但其学术价值高，值得花费大力气去钻研。

一、壮家人的根

壮族是中国南方古老的土著民族。自旧石器时代初期起，广西大地上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② 柳江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化石，1958年发现于广西柳江县新兴农场通天岩旁的一个洞穴之中。

^① 许慎：《说文解字》，1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贝字的解释：“至秦废贝行钱”，说明到了秦之时贝才完全退出流通领域。从商到秦，应该有一段是钱贝并用的时期。

^② 百色旧石器分布在平果、田东、田阳、百色、田林等地的右江两岸第四阶地上。年代距今100万年至73万年。见黄慰文等：《百色石器的时代问题》，见《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30周年文集》，23~3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柳江人代表蒙古人种的一种早期类型，根据吴汝康先生的研究，柳江人头骨上的前囱点位置较后，眼眶低矮，面部短而宽，保留有较多的原始特征，是中国以至整个东亚迄今所发现的最早晚期智人化石。^① 根据张振标先生的研究，柳江人已有明显的阔上面型的上面指数、属于突颌型的面突指数和接近华南新石器时代人的垂直颅面指数，柳江人这些特征与华南新石器时代居民的颅骨性状相一致。^② 周黎明先生把浙江余姚河姆渡人、福建闽侯昙石山人、广西桂林甑皮岩人、广东佛山河宕人四组人类学资料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种群尤其是柳江人和东南亚地区的人种群可能是南方新石器时代居民的源头。^③ 尚虹先生对广西壮族地区已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存多达 100 处，有人类化石近 20 处。除柳江人之外，尚有定模人、麒麟山人、荔浦人、干淹人、九楞山人、白莲洞人、甘前人等。至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则几乎遍及广西全境。从新石器时代起，人类足迹从未在广西大地上间断。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群体质特征已经有了一定的地区差别。黄河中下游与江淮地区关系最紧密，这些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关系又似乎比甘青地区的关系更近一些。^④ 黄河中下游与江淮一带在上古曾经是百越文化分布的地带。这些地方的古代居民不论是古东夷人或是古百越人，他们与华南地区的古人类有关联应属情理之中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后面还有进一步的申说（参见后面 p.11 吕思勉先生的见解）。

① 吴汝康：《广西柳江发现的人类化石》，见《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 1 卷第 3 期，102 页，1959 年 9 月；及丁季华、龚若桢等编著：《中国古代文明起源》，33 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由于柳江人头骨化石不是专业人员所发掘，其化石出土的确切层位未能确定，测年样品与化石的层位关系不明确，对柳江人的年代一直存在争议。沈冠军先生根据对出土柳江人化石洞穴的堆积物重新分析和年代测定，认为其年代应在距今 7~17.3 万年，甚至更早。而据刘武、吴秀杰、汪良的研究，柳江人的头骨比山顶洞人更显现代性，其年代不太可能出现很早。见刘武、吴秀杰、汪良：《柳江人头骨形态特征及柳江人演化的一些问题》，载《人类学报》，第 25 卷第 3 期，2006。

② 张振标：《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体型特征分化趋向》，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 19 卷第 1 期，1981。

③ 周黎明：《试论中国南方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种系源流》，载《东南文化》2003 (3)。

④ 尚虹：《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体质的分布格局》，见董为主编：《第九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153~163 页，北京，海洋出版社，2004。

根据张银运等先生的研究,桂林甑皮岩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属蒙古人种,与现代分布于华南、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南亚种族较接近,与新石器时代的华北居民在头骨绝大部分形态特征上十分相近,尤其与半坡遗址居民更接近。^①他们认为昙石山组与甑皮岩组是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体征的典型。这一类型的居民可能广泛分布于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一带。明显特征是:颅长较长、颅高较低、额部较窄;面部较低而宽;鼻部也较宽阔。这些是新石器时代华南地区居民的普遍特征。^②

张子模、漆招进、朱芳武、卢为善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甑皮岩人与柳江人有密切的亲缘关系。^③阳吉昌先生也认为,甑皮岩人的形态属于黄种人,面部呈阔面型,鼻子呈宽鼻型,齿槽面角,属突颌型,并具有铲形门齿,他们明显直接继承了柳江人的体质特征。^④

1993年,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与广西民族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对“甑皮岩人”与华南和东南亚半岛新石器时代其他人类以及现代壮族的遗传关系进行跨学科研究。结果显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中,“甑皮岩人”与“柳江人”的遗传距离最近;在新石器时代人群中,“甑皮岩人”与东南亚半岛的泰国班清人、老挝人亲缘系数最小,亲缘关系最为接近;在现代人群中,“甑皮岩人”与波里尼西亚人、老挝人、泰国人、越南人的遗传距离最小,遗传距离最近。这些结果表明“甑皮岩人”是连接旧石器时代晚期“柳江人”和现代华南人及部分东南亚人的中间人群。^⑤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明辉等人再次将甑皮

^① 张银运、王令红、董兴仁:《广西桂林甑皮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人类头骨》,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5卷第1期,1977。

^② 张银运、王令红、欧阳莲:《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体征类型初探》,载《古脊椎动物学报》,第20卷第1期,1982。

^③ 张子模:《桂林甑皮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人骨》,载《广西民族研究》,1994(3)。

^④ 阳吉昌:《略论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重大意义》,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0(2)。

^⑤ 张子模等:《桂林甑皮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人骨》及刘文等:《柳州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人骨》,载《广西民族研究》,1994(3);漆招进:《“甑皮岩人”葬俗及其与岭南其他人类的关系》,见《百越文化研究》(中国百越民族史学会第十二次年会暨百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76~393页,见<http://ifc.dhbc.net:88>。

岩遗址人骨测量数据与中国和东南亚半岛现代人群测量数据进行比较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甑皮岩人”与现代华南人和越南人等首先聚类，他们的体质特征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说明“甑皮岩人”的基因在现代华南人和部分东南亚人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甑皮岩人”是现代华南人和部分东南亚人的古老祖先。^①

考古及人类体质学资料显示，现代壮族人与柳江人有人体特征上的共同性。现代壮族人的眼裂较宽，双眼皮出现率高；鼻尖及鼻基部多半为上翘型，鼻高偏低；面部较短，头部大多数短而宽，比汉族小，红唇较厚。^② 这些特征显示，壮族系远古时代的华南原始人类发展而来的。

壮族是土著民族，这也可以从地名角度来证明。地名是人类活动的历史产物，是人类给地形地物的语言标记。最先给一个地方命名的，必定是最先在那里活动的人。广西乃至华南地区有丰富的壮语地名，这些地名以 pja¹ 山、run⁶ 崩、?doi¹ 坡、lu:k⁸ 坡谷、谷地、na² 田、tam² 塘、?bo⁵ 泉等为通名，独自成为体系，有着非常浓重的壮族农业文化色彩。地名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历史承袭性。由壮语地名可以推断，其初始主人也应是壮族先民。^③

从葬丧习俗也可以推断壮族是土著民族。桂林甑皮岩遗址及横县西津、邕宁长塘、南宁豹子头、扶绥敢造等处的贝丘遗址，有大量的屈肢蹲葬墓。屈肢蹲葬是广西壮族盛行的二次葬丧习俗。壮族人民通常在先人故去时用棺木装殓埋上三五年，然后再开棺，捡出骨殖抹擦干净，按蹲坐的姿势把骨殖放到陶坛内另行安葬。这种葬制明显是上古屈体蹲葬的承接。由此亦可看出壮族与这一地区的古代人类有渊源关系。^④

^① 漆招进：《“甑皮岩人”葬俗及其与岭南其他人类的关系》，见《百越文化研究》，376~393页，<http://ifc.dhbc.net.88>。

^② 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壮族通史》，30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

^③ 有关壮语地名的特点，可参阅拙文：《壮语地名的构成与特点》，载《三月三》，民族语文论坛第6期，2003。

^④ 漆招进在《“甑皮岩人”葬俗及其与岭南其他人类的关系》一文中专门讨论了屈肢蹲葬的习俗。他认为广西、广东乃至东南亚的屈肢蹲葬习俗大体是桂林甑皮岩人迁徙的结果。也就是说，有此葬俗的人群应属甑皮岩人的后裔。

从民族的神话传说来看，壮族周边的民族，如瑶族、苗族、侗族等，都有民族大规模迁徙的故事传世。但壮族地区却很少听到这类传说。^①

从汉族古籍的记载来看，商周之后，华南古人的活动已渐见于史。周代时，他们以瓯邓、桂国、损子、产里、九菌等名目载于古籍。秦汉至隋唐之际，他们又以西瓯、骆越、乌浒、俚、僚等见称。宋时又出现“撞”、“僮”等称谓（有时被蔑称写作僮）。明时又有了“俍”的称呼。直到如今，马山平话仍在称呼壮家人为 tsunj⁴²，此即“僮”之音。马山的客家话则说壮族是 loŋ²¹ka³⁵，这是“俍家”之谓。^②

这一系列迹象表明，壮族是土著民族，其文化底层是本土的原生文化。从目前的考古材料追寻上去，壮族的祖先至少可以上溯到柳江人。柳江人是壮族的远祖。他们开创了这一带地方的文明之源。换一句话说，壮族文化的主根是深深地扎在广西这片热土上。

二、百越民族的分布

壮语的使用人口有将近 2000 万之众。^③东起广东连山，西至云南文山，南自北部湾，北达贵州从江，这一大片土地上均有壮族分布。壮族连片聚居在广西的南宁、崇左、柳州、来宾、百色、河池等市及其下辖县以及云南的文山州。壮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字。壮语分南北两大方言，再细分为十三个土语。按语言学界的研究成果，壮语、布依语、傣语、临高语和国外的泰语、老挝语、石家语、土语、岱语、侬语、黑泰语、白泰语、坎梯语、掸语和阿含语等构成台语支。国内通常称台语支为壮傣语支。

与台语支语言最为接近的是侗水语支。其语言包括侗语、仫佬语、水语、毛南语、莫语、锦语、佯僙语、拉珈语、标语、茶洞话等。

^① 韦景云、覃晓航：《壮语通论》，1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另外，海南岛上黎语支的黎语和村语也跟上述两个语支有密切关系。

根据近年来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仡佬语、拉基语、普标语、布央语、耶容语和越南北部的拉哈语等，也与壮侗诸语有联系。这几种语言的使用者人数虽不太多，但各语言内部都有可以肯定的对应关系。它们可以构成仡央语支，与壮傣、侗水、黎等三个语支并列，归并到侗台语族里。^①

台湾岛上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与中国华南文化也有渊源。施德勒(Shutler)和马尔克(Marck)承袭白保罗(Paul K. Benedict)的观点，结合东南亚与台湾史前绳纹陶文化及园艺种植的遗址(如豆类、黄瓜、葫芦、油桐子、稻米等)的发现，推论南岛、傣、加岱(Kadai)三个语群同源。^② 史式和黄大受两先生更是直接认为台湾先住民的族源主要就是百越族群。^③

现代侗台语族居民主要分布在华南和东南亚。语族总人口约近9000万。境外的泰语约有5000万人口，加上傣、岱、壮等，壮傣语支是这个语族的最大语支。侗水语支的人口居次。^④ 因泰、傣、岱等系其族人之自称或他称，所以国外通常称这一语言群团为侗台语族。使用这些语言的民族，其地域东起海南，经广东西部、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并从越南的北部一路经过老挝、泰国以及缅甸东北部的掸邦，西达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这个群团之中以侗族的分布为最靠北，一直达到湖北省境内。

然在古代，侗台语族先民的分布格局并非如此。侗台语族的先民是古百越人。这可以从壮族语言学家韦庆稳先生用现代壮语破译西汉刘向《说苑》中的《越人歌》以及郑张尚芳先生通过泰语破解

^①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6~4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小坂隆一、周国炎、李锦芳：《仡央语言词汇集》前言，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目前国际学术界上对仡央语支的归属尚未达成一致看法，许多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

^② 曾思奇：《南岛语研究与台湾土著的分类》，见吴安其主编：《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第3卷，31~33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③ 史式、黄大受：《台湾先住民史》，14~32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④ 壮侗诸语各民族的人口数目，可参阅李锦芳：《侗台语言与文化》，6~15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越绝书》中的《维甲令》而得到证明。能用现代壮语、泰语去破译记录古百越人语言的文献，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它们之间原本就存在着历史的承接关系。^①

越或百越，古书也常写作粤、百粤。《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其下“正义”有《吴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贺循的《会稽记》云：“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越绝记》云：“无余都，会稽山南故越城是也。”^②陈寿《三国志》载：“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③颜师古的《汉书注》有“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这话说得很明白，在两千多年前，我国东南方居住着一个叫“百粤”的大群团，其人数众多，分布面积很广。普通民众虽不全是少康之后，但越王却是夏禹之后。况且，禹崩而葬于越地，足见越人之地亦属夏禹的地盘。古百越人与夏禹的密切关系由此亦可见一斑。

古越人的文化分布有三个中心：一是以浙江良渚文化为代表的氏族部落，它和后来的“于越”的文化发展相吻合；二是福建的原始氏族部落的新石器文化，它是“闽越”的文化来源；三是两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是“南越”、“西瓯骆越”文化的始祖。^④

古代百越民族的语言应该是相通的。上边提及《越人歌》《维甲令》得到破译就是明证。今温州话还有“喝两碗粥添”（再喝两碗粥）

^① 韦庆稳：《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见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百越民族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及郑张尚芳 Decipherment of Yu-Ren-Ge（越人歌的解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东方语言学报》，(CLAO) 20 卷 2 期冬季号，巴黎，1991。译文（孙琳、石峰译）见《语言研究论丛》，第 7 辑，语文出版社，1997。

^② 司马迁：《史记》，卷 41，1739 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版，1975 年重印。

^③ 陈寿：《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379 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④ 江应樑：《百越族属研究》，见谢启晃等所编的：《岭南外族考》，7~8 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

的句式。^①这种句式是古百越语的遗存而非汉语的固有句法结构。证以壮语: kūn¹ θo:n¹ wan³ ñam³ te:m¹, 喝二碗粥再(再喝两碗粥)。壮语这一句式与温州话完全一致。壮语的副词 te:m¹(再、还)与温州话的“添”对应整齐。温州一带现在已经没有百越系的少数民族了,他们老早转用汉语,同化到汉族之中。然语言中这种带着百越民族烙印的句式还是顽强地昭示着当地居民的古老身份。

郑张尚芳先生也曾撰文讨论过温州话中的百越语底层词:
酒坛子,温州话是“埕”dzeŋ²,龙州壮语说 tciŋ²,马山壮语说 ciŋ²;

鸡虱,温州说 ji²,来宾壮语说 jwi²(北),rei²(南);马山壮语说 rei²;

鸟啄物,温州说“咄”taí⁷,来自古代的*tot⁷,武鸣、马山的壮语皆说 to:t⁷;

柚子,温州说 phə¹ < phau¹,侗语说 pau²,马山壮语说 puk⁸;

抛、甩,温州说 cai⁷,本字考为“抗”,《广韵》于笔切,《广雅》:“投也”。此字在南方方言广为分布:泰顺蛮讲 huət⁷,青田 cyət⁷,上海话 hue,拉珈是 hwit⁷。^②尤其凑巧的是马山壮语有 cai⁶也有 wit⁷!两者均表示“抛、甩、投掷”。细微区分是 wit⁷可用于“抛弃、丢弃”,但 cai⁶无此用法。而 cai⁶有瞄准了再投掷并击中的意味,但 wit⁷却没有这种意味。

这些材料暗示,古代的于越、扬越、闽越、南越和西瓯、骆越等等,他们的语言应有很大的共性。语言有共性,则说明他们的人种很有可能出自一脉。

若再往前继续追溯,古百越人的活动范围还要更加靠北,一直达到山东半岛。张光直先生主张,先商文化应在河南最东部、山东

^① 这一材料系吴莼莼博士提供。吴系温州人,1999年至2002年,我们同在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适逢浙江大学任平教授也在那里作访问学者,我们一道讨论了温州话中古百越词的遗存问题,从中得到不少启发。

^② 转引自潘悟云:《语言接触与汉语南方方言的形成》,见邹嘉彦、游汝杰主编:《语言接触论集》,308~30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西部和安徽北部这一地区内。其文化面貌构成大汶口和龙山文化向商朝过渡的一个阶段。^① 山东半岛和淮河一带是东夷的主要活动地区。据《越绝书·吴内传》对句践《维甲令》的解释：“习之于夷，夷，海也”，^② 可见“东夷”也是“东海”的意思。夏族几次对东夷用兵，引起东夷南迁，一部分东夷人南迁到了越地。吕思勉先生认为越就是居住在江南的夷。山东和江苏的夷人与江南的百越同源，秦以后他们虽然汉化了，但是在血统上还与江南一致。^③

这种地理分布显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古代百越民族很早就与中原的华夏群团发生了密切关系。

三、古百越人与华夏人的渊源

从目前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资料来看，中华大地上自古以来就呈现出一种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考古表明，末次冰期结束以后，气候转暖，东亚的新石器早期开始了，发生了主要是蒙古人种的群体由华南向长江和黄河中下游流域迁移的活动。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和南岛语是蒙古人种居民的语言，这些语言的比较表明它们的原始语是古老的，是史前的语言。它们的发生和分布与蒙古人种的分布和迁移有密切关系。^④

今壮侗诸族的先民是古百越人，古百越人的主要居住地是东南沿海。上古时代百越文化从岭南地区到山东半岛一直有明显分布。可以推测，这当是华南古人类向北扩展而留下的遗迹。前述的人类学、考古学研究结果表明，黄河中下游的古人类与江淮地区的古人类有密切关系，与华南地区的古人类也有关系。直言之，古东夷人与江淮地区的古百越人有关联，与当今华南地区的壮侗诸语民族也

^① 张光直：《早商、夏和商的起源问题》，见《华夏文明》，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② 刘建国译：《白话越绝书》，53页，长沙，岳麓书社，1998。

^③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186~187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

^④ 吴安其：《汉藏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汉藏语的历史分布》，见丁邦新、孙宏开主编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310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